

赵逵夫 主编

历代赋评注

⑥

宋金元卷

主编 霍旭东 李占鹏

赵逵夫 主编



历代赋评注

⑥

宋金元卷

主编 霍旭东 李占鹏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代赋评注/赵逵夫主编. —成都: 巴蜀书社, 2010. 2
ISBN 978-7-80752-421-2

I. 历… II. 赵… III. ①赋—注释—中国②赋—文学
评论—中国 IV. 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2282 号

历代赋评注 (宋金元卷)

LIDAIFU PINGZHU

赵逵夫 主编

-
- 责任编辑 周田青 况正兵
封面设计 文小牛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28) 84122206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 张 25.375
字 数 68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421-2
定 价 450.00 元 (全套 7 册)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宋金元赋概述

霍旭东

宋金元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继续发展并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王朝鼎革，政权交替，阶级斗争十分激烈，民族矛盾异常尖锐，不仅存在着北宋与西夏、辽的冲突和割据，而且存在着南宋与西夏、金以及蒙古的分裂和对峙。这种动荡状况一直持续到元朝建立，国家才出现了暂时统一的局面。金元两朝是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时期，在伟大的历史征程中，它们对促进中华民族的融合和形成，对加速祖国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复兴，无疑起到了关键而显著的推动作用。由于各个王朝都采取了一些稳定社会秩序、鼓励经济发展和加强政权统治的有力措施，特别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往来、交流，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尽管战乱频仍，纷争迭起，但整个社会从总体上却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深刻变化。

文学创作是祖国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它的发展和衍变既离不开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的大背景，又受到各个历史时期文化大氛



围的制约，而其各种体裁、题材的发展和衍变，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虽然人们常说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胜，比如一说到唐就说到唐代的诗和传奇，一说到宋就说到宋人的词和话本，那么一说到金元，自然也就说到金代的院本与元代的散曲和杂剧了。但这不过是把当时的这些文学创作与前代、后代以及当代的其他样式的文学创作相比较而言的。是此并不等于非彼。任何相对独立的文学形式，都有它产生、发展和衍化的过程、规律和特点，在每个历史阶段也都有它不同的地位和成就。也正是由于丰富多彩的不同文学样式的不断发展和衍化，才形成了我们祖国源远流长的文学长河和绚丽多姿的文学园圃。金元两代，虽然原来的文化基础比较薄弱，但随着各自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变化，文学创作也显示了各自不同的特点和成就，同样为祖国的文学长河注入了洪流，为祖国的文学园圃增添了枝叶，也同样应该受到我们的注视和研究。

赋是文学创作领域中的一种特殊样式。它萌生于春秋战国，形成于两汉，中间经过魏晋南北朝与唐宋时期的继续发展和衍变，到金元时期又呈现出新的特点、新的精神面貌，因而也就取得了新的地位和成就。作为文学创作特殊样式的赋，在这一历史时期委实得到了发展和繁荣。所以如此，其中既有这一文体的历史继承性的客观原因，也有这一文体自身衍变和创造的主观原因。

前人论赋，一般只止于汉魏六朝。明复古派文学家、前七子之首李梦阳高唱“文必秦汉”（《明史·文苑二·李梦阳传》），推崇楚辞和汉赋，并提出了“唐无赋”（《空同集》卷四十八《潜虬山人记》）的观点。到了清代，程廷祚又进一步提出了“唐以后无赋”的论调（《清溪集》卷三《骚赋论》中）。于是，后代的一些文学评论家对唐宋以来的赋家、赋作往往采取轻视的态度。有的很少论及，有的即使论及，也极为简单和粗略，甚至包括一些专门研究辞

赋的著述。实际上，这是一种偏见，是以楚辞、汉赋以及魏晋南北朝赋的标准来看待后代赋的。任何一种文学体裁，一旦以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出现在文学创作领域中，也就有它的产生、发展和衍变，每个历史时期甚至每个作家中，都会出现不同的特点和风貌，我们不能以固定不变的观点和标准来看待不断发展变化的赋家和赋作。可喜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研究已经打破了这种偏见并越来越向纵深延伸和扩展。在宋金元赋作方面，除了马积高《赋史》与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都列有专章或专节进行详尽而深入的分析 and 论述之外，一些学术刊物也不时刊载关于宋金元赋的专题论文，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现存大量的宋金元赋家和赋作来观察，它是有着自己的风貌、特点和衍变轨迹的。

据不完全统计，两宋赋今存一千二百篇左右。单就清人陈元龙《历代赋汇》这一搜集较为完备的总集来看，就收录两宋赋家164人，作品568篇。这数量，可以称得上是洋洋大观了。此总集收录金元赋家131人，作品338篇，这只是金元赋家赋作的一部分。据今人粗略统计，金元赋家大约有250人，作品750多篇；稍后又有人统计，光元赋一项就有900多篇，这也是一个令人惊异的数目。由此可见，宋金元时期也是赋作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现就宋金元时期的赋家和赋作的不同风貌、特点及其衍变轨迹作一简要的勾勒和评述。

—

从公元960年赵匡胤建国，到公元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宋室南迁，其间167年的时间，史称北宋时期。

北宋建国后，先后用了将近 20 年的时间，平定了当时割据在大江南北的封建王国南平、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和北汉，基本上统一了黄河和长江流域的领土，而对占领着由东北到西北广大地区的契丹部族所建立的辽王朝和日益兴起的党项族所建立的西夏，却始终无力征战和抗争，以致最终被东北兴起的女真族所建立的金王朝所攻灭。因此，从政治形势上说，从建国起它就遭到北方民族的威胁。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宋太祖、宋太宗都在用兵统一的同时，着力于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改革、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和政策。在思想文化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重知识、重科举、奖励著述的办法，大力笼络和引诱知识分子。其中，在科举考试中，重经学、重史学、重法学、重实用之外，以诗赋为主的进士科虽然时断时续，但对知识分子的仕进和写作，影响还是很大的。

北宋初年，文人沿袭晚唐五代的传统，作赋之风盛行不衰。很多文人，以赋作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青睐和时人的传诵。《宋史·梁周翰传》记载，宋太祖乾德年间，梁周翰（929—1009）为右拾遗，会修大内，上《五凤楼赋》，时人传诵不已；《宋史·夏侯嘉正传》记载，夏侯嘉正使巴陵，作《洞庭赋》，人多传诵，宋太祖闻其名而召试之，擢为右正言、直史馆。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中也说，宋太宗欲兴文治，广致天下之士，曾试《训练将士赋》以选材，吕蒙正以文词“雄丽”而见赏。由此可见，北宋初年，赋文的写作是很兴盛的。但是，这时的赋，由于沿袭了晚唐五代的遗风，再加上科举考试中又以律赋为主，所以律赋的写作在当时占有着极大的优势，很多文人几乎都写律赋。这种赋体是由骈文、骈赋发展而来的，不仅讲究对偶精切、音律协谐，而且限制用韵，甚至限制字数，具有较强的形式美和音乐美，一些有才能的作家也确实写出了一些优美的作品，如田锡（940—1003）的《雁阵赋》《春色赋》

《晓莺赋》，王禹偁（954—1001）的《尺蠖赋》，范仲淹（989—1052）的《金在镕赋》，欧阳修（1007—1072）的《藏珠于渊赋》等等，大都写得简洁、凝练，以工丽见长，语言生动、细致、华美，感情真挚、细腻、深厚，或写景，或抒情，都能在流丽中见性灵，在骈俪中见情致，在典雅中见讽喻，还是有一定的艺术创造和艺术技巧的，值得我们学习和鉴赏。

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吴淑（947—1002）的“事类赋”。吴淑是宋初著名的学者，曾参与过《太平御览》和《文苑英华》的编撰工作，学识广博，文笔工雅，曾以天文、岁时、地理、宝货、音乐、服用、什物、饮食、禽兽、草木、鳞甲、昆虫等部类中的名物为题材，以一字为题，连缀成赋，写出了“事类赋”百篇，甚受时人的传诵。虽然语言精美，对偶精工，史实语典也使用得比较恰切，但它毕竟不是以写景抒情为目的，因此只能标明当时的一种写作风气，而不能算作真正的文学作品，《四库全书》就把他的《事类赋》30卷放在类书之中。

从整个文学创作的形势看，律赋虽然有它清新、工丽、富于情致的一面，但总使人感到它华而不实、文格卑弱，既缺乏深刻广泛的生活内容和重大的社会意义，又缺乏刚劲豪迈的气势格调和鼓舞读者的艺术力量。因此，一些有胆识、有创造的作家，也就不满意这种文体而力图另辟蹊径，以改变这种文风。在当时，梁周翰、张咏、路振的作品出现，就表明这种文学创作的新趋势。

梁周翰（929—1009）的《五凤楼赋》，单从题目上看，是歌颂楼台殿阁的一类作品。从东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三国魏何晏的《景福殿赋》起，传统的写法是极力描绘宫殿的雄伟、壮丽，到了晚唐杜牧的《阿房宫赋》、孙樵的《大明宫赋》时，又逐渐增强了抒情和议论的成分，以至根本不写宫殿本身而借以抨击社会现

实。而梁周翰的《五凤楼赋》，更加另辟蹊径，先从汴京的历史、形胜和宋朝开国的声威写起，次及五凤楼的雄伟、壮丽，而最后竟用极大的篇幅，并以君臣对话的口气大发议论，响亮地提出了亡国之戒的问题。五凤楼是宋太祖在宫中修建的一座高楼，不管宋太祖在当时是否说过这类的话，梁周翰敢于这样写应该说是大胆识的，因而也是有现实意义的。其行文，完全打破了律赋的格局，虽有骈丽而富气势，语言也简练而有文采。

张咏（946—1015）的《声赋》也别具一格。全文紧紧扣住“声音之道与政通”这一主题，借“声”言政。它从“天声”写到“人声”，又由“亡国之音”写到“治世之音”，连帝王的声教号令与人民对它的反映也当作“声”来写，从而把“声”的理解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进而赞美和歌颂了宋初的善政，这在同类题目的赋作中，是自有特色的。全文不用俚语而富文采，整篇一气直下而富气势，语言参差又夹叙夹议，被梁周翰誉为“百年不见之作”，预示了北宋的赋作将有新的突破和变化。张咏作为《西昆酬唱集》的作者之一，更显得难能可贵了。

如果说，梁、张诸人还只是少量篇章，不足以总括当时赋作的总情势的话，那么，王禹偁在赋坛上的出现，则展示了北宋初年赋作的新趋势。王禹偁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者之一，能诗能文，赋的成就也很高。他既善于写律赋，又会写古赋。其《小畜集》中今存赋22篇，包括律赋14篇、古赋5篇及虽题为“文”而实际为赋的作品3篇，这在同时的作家中应该是首屈一指的。他的律赋在当时很有名，风格清新自然、平易流畅、“一往情洩”（李调元《赋话·新语五》），《尺蠖赋》可视为这一类赋作的代表，多有白居易诗风的特点。其古赋清新雅致，叙述简明而议论有力，行文中虽常用典，但自然无痕，句式也起伏多变，错落有致，《藉田赋》

《三黜赋》都是这类赋作的名篇。但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几篇以文命题的赋作，《吊税人场文》《沮掠剩文》，就更具有强烈的社会意义、政治意义和思想意义。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王禹偁是一位由晚唐五代律赋向两宋文赋转化的代表人物。

由此可见，北宋前期，是律赋逐渐衰落而行文比较自由、语言日趋散文化的文赋逐渐兴起的时期。从现存的赋作来看，两汉的逞辞大赋铺张扬厉、穷描极绘，力求摹景状物的“形似”，而这时的文赋，就事议论，借题发挥，又逐渐向尚理方向衍变了。虽然晚唐赋如杜牧《阿房宫赋》、孙樵《大明宫赋》已有强烈的议论说理的色彩，但在那时这样的篇章是不多的，而到北宋梁、张、王的出现，这种好议论、重说理的作赋手法，几乎成了时人普遍的习尚。

北宋仁宗（1023—1063）之后，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统治阶级内部革新与反革新的斗争也逐渐进入高潮，而经济、文化以及文学创作，都相应进入了相对繁荣的时期。这时的赋作，各种体制、各种风格都已出现，律赋、骚赋、文赋可谓各领风骚。如果说仁宗前及仁宗初期如范仲淹、宋祁（998—1061）、叶清臣（？—1051左右）等人还是以写律赋、骈赋为多的话，那么到了梅尧臣、欧阳修之后，他们虽写律骈之体，但古体赋却明显地增多了，并出现了文赋对律赋取而代之的趋势。也正是在这种赋体大转变的过程中，两宋文赋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范仲淹（954—1001）是一位政治改革家，他所推行的“庆历新政”揭开了统治阶级内部改革与反改革的序幕，同时表现在文化思想上，他也主张诗文革新。他善于诗词，散文也佳，《范文正集》中今存赋36篇，说明他也是一位写赋的能手，其数量之多，当时也是少见的。他的作品，虽然大多是律体，但往往借题发挥，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显示自己的抱负和人格，这对进一步摆脱传统律

赋狭小的思想感情领域，开拓和提高赋作的思想内容、意义和品格，显然是有推进意义的。他的《金在镕赋》《明堂赋》《灵乌赋》《稼穡为宝赋》等等，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和意义。

与范仲淹同时的宋祁（998—1061），也是一位赋作的多产作家。其《宋景文集》中存赋作44篇，而且大都是律赋，《右史院蒲桃赋》就是其中有名的一篇咏物抒情的骈体赋。作者表面上是描述移自西域寒乡的宫院蒲桃的枯萎，实际是感叹自己久居史院修撰史书的寂寞、失意的生活和心情，文辞雅淡，文意婉转，语言自然，感情真实，字里行间不时跳动着精美的文采。最后的“乱曰”，更加含蓄而富寓意。这是与某些华而不实、无病呻吟的律赋不可同日而语的。

叶清臣（1033—1051）今存骈体《松江秋泛赋》一篇，写景清丽，叙事晓畅，抒情自然，并将三者熔于一体，以范蠡、张翰、陆龟蒙的避世隐居与自己的“思勤官而裕民”的思想相对照，既表现出对前人的理解和同情，又展示出自己的心胸和抱负，其思想意境是很高的，在北宋人的游览赋作中，也是不可多得的。

梅尧臣（1002—1060）、欧阳修是北宋中期诗文革新的主将，特别是欧阳修，他曾明确提出了“文以明道”的主张，积极继承和发扬唐代韩柳平易自然、明朗流畅的文风，并凭借他的政治地位和文学声望，培养了一大批作家和文人，从而成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梅尧臣可以说是他的羽翼，王安石、苏氏兄弟可以说是他的后续。他们虽然也都写律赋，但成就最高的却是散体赋。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才使具有自己特色的宋代文赋正式形成了。欧阳修的《秋声赋》是传诵千古的名篇，是当时文赋的代表；其他各种体制的赋作，诸如《鸣蝉赋》《苍蝇赋》《藏珠于渊赋》《荷花赋》《黄杨树子赋》等等，也都写得情景交融、情理交融而有声有色。梅尧

臣的《南有嘉茗赋》《灵乌赋》《针口鱼赋》《凌霄花赋》《矮石榴树子赋》《乞巧赋》等等，或托物寄意，或直抒胸臆，或讽喻现实，都具有较大的社会意义。其他如刘敞、刘攽、李觏、文同等，也都写出了一些艺术效果较好的作品。

在欧、梅等人的影响下，文人们以赋为文的风气很浓，连一些史学家、政治家、理学家和经学家如司马光（1019—1083）、王安石（1021—1086）、周敦颐（1017—1073）、张载（1020—1077）、王回（1024—1065）等人，也都写起赋来。如司马光的《交趾献奇兽赋》《灵物赋》，王安石的《龙赋》《思归赋》，周敦颐的《拙赋》，张载的骚体赋《鞠歌》以及王回的《驷不及舌赋》等，都更加增强了议论说理的成分，以宣传他们理想中的思想、道德和情操。特别是司马光的《交趾献奇兽赋》，简直就像一篇有韵的议论文。在他们的影响下，宋人好议论、说理的风气，赋作中尚理的倾向，得到了更大的煽扬和发展。

苏轼（1037—1101）在宋神宗时继欧阳修而成为文坛领袖，时为北宋中后期。他是北宋诗词文赋最有成就的集大成的作家，也是由唐赋向宋赋转变过程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代表性最强的人物。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性格豁达、才气纵横。其词，开创了两宋词坛的豪放词派；其文，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在后世被归入“唐宋八大家”。但是，由于他的思想驳杂，论事立说、剖析物理和为人处世也常出入于儒、道、释诸家学说之间而与众不同，因而不仅与前后的执政者王安石、司马光的政见不同，而且也与当时的理学家程颢、程颐等人的思想相左。他本来是鼓吹整顿朝纲、改革弊政的，但当王安石全面推进新法时，他却主张维持祖宗的某些旧制；后来司马光执政，元祐党人尽去新法，他又认为新法不宜完全废除。这些出入于儒家中庸而又以我为是的政治态度，致使他在变

法与反变法的斗争中遭受到了极大的政治磨难，仕途坎坷，历尽沉浮，生活道路也曲曲折折，极不稳定。频繁的贬调，使他几乎走遍了当时北宋统治的大半个中国；讽刺新法、议论朝政的诗文语句，也使他蒙受了“乌台诗案”的苦痛。好在，他不依附权贵，也不热衷于权势，自有一种与世无争、超然物外的洒脱、豁达的心胸和风貌。由于他的思想和性格与众不同，在文学创作上也具有了自己独特的观点和主张，具有了自己独特的思想和风貌。他继承了前人的传统，又力图摆脱前人的局限，从而响亮地提出了“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寓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的口号，以“意”作为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他的赋，今存近三十篇，有律赋、骚赋，更多的是散体赋。这些赋，思想开阔，胸襟旷达，对人情事理具有深刻的辨识，富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言理色彩，字里行间充满着深邃的思辨和生活的睿智，行文如行云流水，体制不拘一格，语句参差错落，手法变化无穷，正如他自己所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与谢民师推官书》），使读者具有无限的美感和隽永的回味。著名的《赤壁赋》，“学庄骚文法，无一句与庄骚相仿，非超然之才、绝伦之识不能为也”（谢枋得《文章轨范》卷七），可以说是通于造化而非人力的“奇妙之作”（吴汝纶语，见《评注古文辞类纂》）。它把情与景、主观与客观、古与今、幻想与现实融为一体，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情深理邃的艺术境界。其他如《滟滪堆赋》《秋阳赋》《屈原庙赋》《黠鼠赋》《昆阳城赋》等等，或思想见解新颖独特，或艺术表现精巧奇异，都给宋代文赋的花园增添了色彩。一句话，苏轼的赋作，既继承了前人的优秀传统，又开拓了两宋文赋特有的精神风貌，从而确立了两宋文赋在中国赋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苏轼的影响下，他的弟弟苏辙（1039—1112）、少子苏过

(1072—1123)、“苏门四学士”黄庭坚(1045—1105)、秦观(1049—1100)、张耒(1054—1114)、晁补之(1053—1110)以及他的亲友文同(1019—1079)等，也都写出了一些优秀的赋作，并进一步继承发展了苏轼的赋风。本来苏轼的赋作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直接抨击现实生活的就不多，到了后继者时，由于文网日渐严密，由于新旧党争的激烈，特别是由于苏轼“乌台诗案”、蔡确(1037—1093)“车盖亭诗案”的打击，虽然当时的社会矛盾已极为激烈、尖锐了，但他们面对现实、揭露矛盾的胆识和勇气却越来越小了，只有某些作品，还能够正视现实。苏辙的赋，无论是气势还是成就都不如其兄，同题的《屈原庙赋》也不如其兄论述透辟，语言有气势，但以屈原生不见用和死后从舜、出言无忌相对比，就含有批判专制制度的意义。他的《黄楼赋》虽不如秦观的同题之作写得那么简练，但写水患的情景，写登楼所见的风光，亦甚生动，不失为写景抒情的佳作。苏过的《飓风赋》，曾误传为其父所作。它生动地描绘了台风即来、来时及过后的种种景象，意欲从大自然的景象上来寻求天人感应的轨迹，挖掘其中所包含的人生深邃的哲理，其思想、气魄，也确有乃父之风。黄庭坚是北宋“江西诗派”的祖师，诗学杜甫，强调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字字有来处，但其赋却写得想象奇兀，颇多言外之意。他的《苦笋赋》借题发挥，言外含有讽刺；他的《毁璧》，乃为其妹的不幸婚姻而作，辞语哀婉，声情俱下，虽哀而不怒，亦感人至深。他把妹妹的不幸遭遇悲叹为“毁璧殒珠”，实际是控诉封建礼教对这位聪慧可爱的少女的迫害。秦观的赋虽然显得气势不足，但简练、精美而富情思。《黄楼赋》表彰苏轼善处苦逸的哲人风范和思想境界，风格清雅；《吊傅钟文》感叹傅钟的长期埋没，构思新颖。《郭子仪单骑见虏赋》是一篇律赋，歌颂郭子仪的忠诚和勇敢，也写得颇为整洁和秀美。张耒更是

一位大力作赋的人，今存赋四十余篇，大都“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音”（《宋史》本传引苏轼语），进一步发挥了苏轼“尚意”观点，把言情与寓理结合起来，不雕琢、不隐晦，直寄其意，比之黄、秦，则另有一番风趣。著名的《雨望赋》怒恨暴风骤雨，境界开阔，笔力雄健，用语新奇而暗含政治寓意；《鸣鸡赋》从西晋刘琨、祖逖闻鸡起舞事入题，抒写了“业无高卑志当坚，男儿有求安得闲”的情怀，雄鸡的那种“意气武毅”、“奉职有恪”、“孔肃靡争”的精神状态，显然是他晚年心志的写照，表现出一种昂扬奋进的精神，给人以鼓舞。晁补之的赋多抒情言志之作，其《江头秋风辞》以晋张翰弃官归里的故事为发端，杂用杂体与散体，写出了自己不愿卷进北宋末年新旧党争的漩涡而意欲归隐田园的心情，语言简洁明快，语意曲折起伏，亦颇富风致。以上这些，虽其成就达不到苏轼的高度，但其风格，都明显地受到了苏轼的影响。他们上承欧、梅、苏的余风，在时代及政治环境的限制下，虽没有反映出重大的社会问题，但抒情言志，抒发自己的道德情操观念，还是有其时代意义的。

北宋后期，除了上述大家外，留有赋作的还有狄遵度、米芾（1051—1107）、邢居实、程俱（1078—1144）等人。狄遵度的《凿二江赋》歌颂了李冰在四川治水的功绩，风格简古、气势雄肆；米芾的《参赋》《壮观赋》精悍豪迈，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在北宋赋中也应该说是少见的。邢居实英年早逝，幼童时就受到“苏门学士”的喜爱，其《南征赋》写随其父邢恕由京到川情景，颇似班彪《北征赋》、潘岳《西征赋》的构思，怀古、写景不假雕饰，语言真率而动人，大有古赋遗风，被朱熹誉为“神会天出，如不经意，而无一字作今人语”。程俱的《采石赋》直接讽刺宋徽宗为修神宗庙而大采太湖石的情景，在当时算是大胆之作了。

总之，北宋是律赋逐渐衰落、文赋逐渐兴盛的时期。在赋体和赋风转化、衍变的过程中，众多的赋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做出了贡献，而苏轼继往开来，更以自己的创作和影响奠定了北宋赋在赋史中的重要地位。北宋的主要赋作，以文为赋，以理入赋，具有自己的特点和风貌，除了具有不拘声律、不拘对偶、不拘四六而自由疏朗、气韵流动的散文化的艺术形式外，还具有以景寓意、以情喻理、或直接说理议论的理意和理趣，充满着尚理、崇理的倾向和特色，在中国赋史上是具有它重要的地位和贡献的。

二

从公元 1127 年“靖康之难”、徽钦二帝被金人掠去、宋康王构仓皇南逃、至临安建都起，到公元 1279 年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是我国历史上的南宋时期。

这一时期，先是金人的不断进攻，后是元蒙军的猛力入侵，致使民族矛盾尖锐、激烈，广大人民普遍增强了民族意识和爱国情绪。南宋统治者卑弱无能，对异族的进攻和侵略，一直采取了忍让、妥协和投降的政策，使主张抗金的将领和士人，一直处于被排斥、被压抑的境地，因而统治阶级内部抗金派与投降派的斗争也异常激烈和尖锐。南宋的腐败和怯弱，更比北宋加剧，而其剥削、压迫人民的手段，比之北宋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当时的阶级矛盾也是激烈尖锐的。但是，由于北方广大领土陷入金人之手，经济和文化的优势也随着宋室的南迁而转入南方。在偏安一隅的江南地区，农业经济，特别是通过疯狂掠夺而来的地主庄园经济相对地得到了发展和提高，以商业、手工业为主体的城市经济，也得到了发展和繁荣。在文化上，市民文化迅速兴起，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学

创作也呈现出新的精神和面貌。

从赋的创作来说，南宋的赋家虽然是沿袭着北宋王、欧、苏、黄所逐渐开辟、确立的文赋道路来创作的，但从大量的赋作实践来观察，赋与诗的距离越来越远，散文化的倾向也越来越重。北宋中期那种平易晓畅、以文为赋的赋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以理入赋、说理议论的成分也越来越多。北宋赋家，大多能诗、能词、又能文，而南宋的赋家能够兼善者则相对减少了，特别是理学家涉入文坛，更使这时期的赋作逐渐减弱了文艺性。不过，由于民族矛盾的激化和阶级矛盾的加剧，一些表现民族矛盾的爱国思想的作品，一些揭露社会问题和讽刺现实生活的作品，则相对比北宋增多了起来。

李清照、李纲、晁公溯、陈与义等，都是跨越两宋之际或主要生活在南宋之初的人物。他们大都经历过“靖康之难”的苦难，具有抗金复国的爱国思想，因而他们的赋作在思想内容上就给南宋初期的赋坛带来了新的精神面貌和气息。

李清照（1084—约 1155）是两宋具有重大艺术成就的女词人。由于她亲身经历了国破、家亡、南迁、夫死的苦难生活，所以词作中就更多具有了哀时叹世的凄苦和感慨。可惜，她的赋作只留下一篇《打马赋》，但就在这篇仅存的《打马赋》中，却抒发了她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感情。打马，本是一种游艺活动，而她却以棋局写战局、以对弈喻战阵，从中寄慨言志，寄寓了沉痛的忧国之思，被后人誉为奇工的“神品”（王士禄《宫氏籍艺文考略》引《神释堂脞语》）。李纲（1085—1140）是当时著名的坚持抗金的政治家，为了挽救南宋初期腐败卑弱的政治局面，他曾提出了积极改革的“十项建议”，可惜由于投降派的坚决反对，只为政七十天就被排斥了。后来，他虽然多次上疏陈述抗金大计，也没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采纳。他的《江上愁心赋》写于“靖康之难”前，却已表现出对北宋